

#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杨典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拓展国际视野,形成面向全球的知识共同体,打造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知识生产格局。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封闭保守,排斥西方和其他外来知识体系另搞一套;相反,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真正形成特色并建立自主性。

## 古代诸文明与西方知识体系霸权的建立

知识体系不是各类知识、信息、数据的简单加总和汇集,而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的理论体系、规则体系与价值体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文明的认知框架,体现着某种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世界八大古代文明体系都有其独立的知识体系。古埃及文明以神权为基础,形成了与祭祀和宇宙观紧密结合的神圣型知识体系;古巴比伦文明发展了以神庙为中心,兼具宗教、行政和教育功能的综合型知识体系;古印度文明构建了以宗教机构、宫廷与贵族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扩散型知识体系;古希腊文明形成以哲学为主导、涵盖“七科”的理性知识体系;古罗马文明通过法律、政治和军事实践,形成了以法治与行政管理为核心的制度型知识体系;伊斯兰文明融合希腊哲学、波斯智慧与本土宗教文化,形成了跨地域的中间型知识体系;玛雅文明则建立了以祭司阶层为主导,融合天文学、历法和宗教仪式的统合型知识体系;中华文明则形成以儒道释为核心,贯通礼学、伦理与天下观的传统知识体系,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思想精华和民族特性,反映了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社会观、自然观和审美观。自主且强大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不但有效维护了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自信和意识形态安全,同时扩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

响力。由于交通和通信手段的落后,各大文明之间多是阶段性和局部性交流,没有对彼此产生全局性和根本性影响。因此,古代诸文明及其知识体系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独立性和多元性。

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西方知识体系本来只是人类多种知识体系中的一种,但由于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并基于其现代化经验建构起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而取得主导地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基于西方地域性经验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依托西方政治经济霸权变成貌似客观的全球性知识霸权体系。西方知识霸权的确立无法适应人类知识体系的多样性需求,不仅不利于诸多非西方国家的思想独立和发展道路独立,也使得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互鉴面临重重困难。

##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既是独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独立文明提供认同基础、意义解释和思想支撑。中华民族在古代传统文明阶段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创造了辉煌的传统文明,在现代文明阶段依然可以建立自主且强大的知识体系,创造辉煌的现代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不仅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源泉与基石,更是其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以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发展理念和制度安排,打破了人类对西方现代化的迷思与依赖,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坚持中国式现代化这条独立发展道路,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摆脱西方知识体系对何为现代文明、何为现代社会的定义权和垄断权提出紧迫要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现代化实践的深刻反映,不仅要求理论上的自主创新,更呼唤精神和思想上的独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对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挖掘与现代诠释,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核心要义,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涉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更包括对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吸纳与融合。

## 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创新知识生产传播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体现出独特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无论是与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还是通过丝绸之路的广泛联通,中华文明始终不乏吸纳、融合和再创造的能力,展现出超越时空的包容格局。然而,进入近现代,西方知识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使中华文明的外部互动逐渐失衡,尤其在学术领域,西方理论一度成为主导性话语。构建能够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并与世界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任务。

**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首先,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内在特质和思想脉络。其次,要放眼世界,广泛吸纳其他文明的智慧与经验,从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西方文明进行系统理解和再认识,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尽管源自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历程,但其在方法论上的发展仍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也要深入研究非西方文明,包括印度、埃及以及中东、拉美、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文明。每一文明都有其独特社会结构、文化理念和发展轨迹,这些差异性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经验素材和思想启示,可以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更多全球化视角和方法论的多样性。通过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互动与借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将得以超越本土视野的局限,拓宽学术研究边界,提升包容性、科学性和解释力。

**拓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影响力。**每个民族都渴望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得到尊重与传播。文化的传播绝非单方面的自我宣扬,而需要站在受众角度,理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深层经济社会问题、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传播亦应遵循这一原则,不能想当然地将我们的成就与理念强加给外界,而要精准把握各国文化的独特需求,创新传播策略,深入人心地传播中国理论。在传播方式上,应积极利用各种传统和现

代传播渠道,包括社交媒体、学术期刊、国际会议等,在多样化传播中提升国际交流与对话能力。

**强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运用涵盖两大核心维度:一是从理论视角解析全球经济社会现象,为世界多样化发展提供新的认知框架和中国智慧;二是以实践经验助力解决他国实际难题,为其他国家的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为解释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现象提供了独特视角,为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认知框架,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中国在全球脱贫攻坚、粮食安全、数字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瞩目的发展典范。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通过系统总结这些经验,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借鉴。中国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实践,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案例;在数字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国方案更以其高效性和可持续性,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构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范式。**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揭示经济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与内在逻辑,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传统方法已无法应对复杂而多变的现实挑战。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以跨国、跨文化、跨时段的宏大视野,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方法工具。通过不同国家、文化和历史时期的比较,揭示社会结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之间的普遍性规律与个性化特征。在实践领域,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解释力与适用性。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社会变迁的纵向比较,能够更深刻理解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化逻辑。这一方法从历史的深度、文化的宽度和全球的广度出发,赋予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独特的理论创新能力与实践适应性,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经验的理论表达,也为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的共生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与行动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农业发展直接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经济社会稳定。面对耕地日益减少、资源环境要素约束趋紧、农业科技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提升农业生产力。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部署,指明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农业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技术、高质量、高效能特征,由农业科技颠覆性突破,农业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农业生产方式革命性变革,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形成的生产力。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需做好科技、企业与人才三篇文章。

**一是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能。**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必须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技术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竞争力。随着我国育种技术进步,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45%以上,但核心种源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需进一步加大对农业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攻关力度,集中有效力量攻克技术难度高、覆盖面广、关联度强的关键技术难题。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仍然偏低,需加大种业基础研究投入,发挥财政资金引导示范作用,力争在农作物育种、畜禽育种、微生物育种上实现革命性突破。围绕农业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打造自主可控的农业共性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平台,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因地因作物推进良田、良种、良技等融合。

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须将绿色低碳技术赋能于现代农业。加大农业减污降碳增效技术攻关,充分利用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等智慧农业技术,减少农业生产用水量及化肥、农药使用量,严防面源污染。研发和应用智慧减碳技术,降低农业碳排放。推广节水农业技术,重视发展旱作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规范整治,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种植养殖模式,构建循环农业产业链。

大力推动农业数字化场景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及创新平台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拓展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等技术应用场景,开展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二是培育一批农业科技企业。**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既需培育一批“顶天立地”龙头型科技创新领军企业,也需培育更多引领地方农业差异化发展的“铺天盖地”高成长型企业。截至2024年底,我国与智慧农业相关的企业总量已突破8.3万家,但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龙头型科技创新领军企业数量较少,制约了我国农业产业迈向高端化、国际化。要着眼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重视提升农业科技企业内生的创新能力,持续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培育一批农业领军企业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作用,支持其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参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决策。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农业重大科技攻关任务。通过税收减免、专项补贴等政策工具,激励农业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降低创新成本。

发挥金融对农业企业创新的支撑作用。完善农业企业上市培育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科创板、创业板等上市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保障。设立农业创新型企业支持引导基金,重点投资智慧农业、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各地可根据情况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支持种业、智能装备等战略领域,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资本反哺”的良性循环。

**三是培养造就新型农业劳动者队伍。**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数量多寡、水平高低直接决定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效。需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打造一支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新型农业劳动者队伍。

重视农业科技人才引进培养。采取有效措施吸引优秀人才投身农业,制定具有吸引力的高端人才政策。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人才交流合作,培育创新型农业科技人才。加强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的人才交流与合作,引进一批农业领域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产业需求、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涉农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涉农职业教育水平,鼓励职业学校与农业企业等组建产教联合体,培养一批农业科研型拔尖人才、复合型农业科技人才等。

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力度。建立职业农民培训与农业产业发展对接机制,根据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通过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的方式,利用线上线下教学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培训活动,提升农民的 digital 技能和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能力。

建立以创新能力、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农业人才评价体系。构建定位精准、科学合理的农业科技人才分类评价制度。鼓励高校教师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将科研活动从实验室转向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优化农业人才薪酬体系,提高农业人才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设立农业人才创新创业奖励基金,对在农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农业人才给予表彰奖励,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生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城乡融合

冒佩华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形态,以县城为枢纽、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既能将城市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又能通过乡村土地、生态、文化资源为城市发展提供支撑,在要素配置、产业协同等方面构建起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范式。

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梗阻。传统城乡关系中的要素流动呈现出明显的“虹吸效应”,劳动力、资本等要素持续向城市集聚,而农村土地、生态资源则因产权界定模糊与市场化机制缺失长期处于低效配置状态。县域经济通过构建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起要素双向流动的资源配置机制。另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有助于重构城乡产业分工格局。传统城乡产业体系多呈现垂直分工特征,城市以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农村往往局限于初级产品供给,这种割裂导致农村长期依附于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自主产业。县域经济通过构建横向分工与纵向整合相结合的产业协作体系,使城乡产业从梯度转移转向有机融合。

发展县域经济的重点是通过小城镇与农村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小城镇作为城乡要素交汇之所,在城乡融合中扮演着“联结人”角色。小城镇凭借要素集聚的优势,支持农村破除发展要素流失、产业断层与组织弱化的瓶颈;农村则依托资源禀赋与空间条件,为小城镇功能的辐射提供广阔腹地。

首先,小城镇有助于弥补农村发展要素的劣势。小城镇能够集聚并向农村输送管理型人才,这类人才的核心价值不在于技术专精,而在于其整合分散的经营主体、重构生产关系的组织能力。通过创新合作社模式、搭建利益联结机制,能够将分散的农户转化为具有市场议价能力的经营联合体,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经营形态。小城镇的科技服务平台能够成为农业技术扩散的中转站,通过将标准化生产流程、数字化管理工具向农村传导,推动传统农业

向精准化、智能化转型。小城镇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借助供应链金融、土地经营权抵押等工具,破解农村资产确权与风险定价难题,引导社会资本支农惠农。

其次,小城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改善基础设施,为农村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通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的梯度配置,小城镇形成对农村人口的适度集聚效应,既避免了资源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又为农村留住人才创造了可能。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布局,降低了物流、信息、能源的流通成本,使分散的农村资源在城乡之间流动并优化配置。此外,依托县域统一的要素交易平台与产权管理体系,小城镇通过制度供给为农村资源资本化提供实现路径,使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收益权等“沉睡资源”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发展资本。

再次,小城镇与农村融合发展能够构建纵向整合与横向联动的产业生态。在纵向上,小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关键支撑:前端通过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与精深加工园区,将初级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后端依托物流枢纽与电商平台建设,打通农产品上行与工业品下行的双向通道。这种“前延后伸”的产业链布局,使农村得以突破生产环节的价值锁定,通过参与加工、流通等环节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在横向上,小城镇有助于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业态深度融合,引导农村特色产业从同质化竞争转向差异化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的落脚点在以县城为枢纽实现城乡融合。作为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县城不仅要发挥在县域内的引领作用,而且要通过内外协同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枢纽。

县城的枢纽作用体现在对县域经济体系的构建能力上。作为行政、经济、文化三重功能的复合载体,县城通过要素配置机制的重塑,将分散的县域空间整合为有机系统。在要素流通维度,县城通过建立统一产权交易平台与人力资源市场,使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收益权等权益实现跨空间优化配置,小城镇的衔接功能则将这些要素精准传导至农村生产单元。在产业组织层面,县

城通过建设产业园区来优化城乡产业布局。高附加值产业集群县城,配套产业梯度分布至小城镇,基础性生产单元则布局于农村,有效改进了县域经济体系的发展能力。此外,县城作为城与乡的交汇点,通过优化制度供给可以更好消除城乡壁垒,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盘活存量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活力。

县城的枢纽作用表现为对内外资源的整合转化能力。作为区域经济网络的次级节点,县城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与信息通道建设,既承接城市的技术溢出与产业转移,又将县域特色资源接入更广阔的市场网络。当县城将外部资本、技术要素与本地劳动力、土地资源创造性结合时,便能培育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另外,在要素整合方面,县城通过建立要素交易中心,使县域土地经营权、碳排放权等要素权益有序流转,既提升了资源使用效率,又为乡村生态价值转化开辟了通道。

发挥县城枢纽功能的最终目标,在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治理范式。通过建立县域统一的要素市场、产业标准与公共服务体系,县城将分散的行政单元转化为协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在要素配置方面,县城通过大数据平台实现劳动力、土地、技术的动态匹配,使小城镇能够根据比较优势承接

适宜产业;在产业协同方面,县城制定县域产业规划,明确区域内各小城镇功能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在生态补偿方面,县城通过纵向转移支付机制,促进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种范式既保持了“县城—小城镇—农村”县城三级单元的差异化特征,又通过制度设计形成发展合力。县城通过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生态红线与产业边界,小城镇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特色经济、农村依托资源禀赋培育绿色产业,县域空间从机械拼合转向有机共生。这种变革的深层逻辑是通过县城的制度创新能力将城乡差异转化为互补优势,使发展成果在县城三级单元间实现普惠共享。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要避免发展模式异化的负面影响。县域经济发展不能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要以其生态承载力为产业布局的前提。防范城乡环境治理的割裂化倾向,不能以乡村生态退化为代价改善县城发展环境。避免工业化思维对乡土文化的消解,要将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理念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在空间重构中保留乡村肌理与传统智慧。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